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背后的故事

——纪念孙执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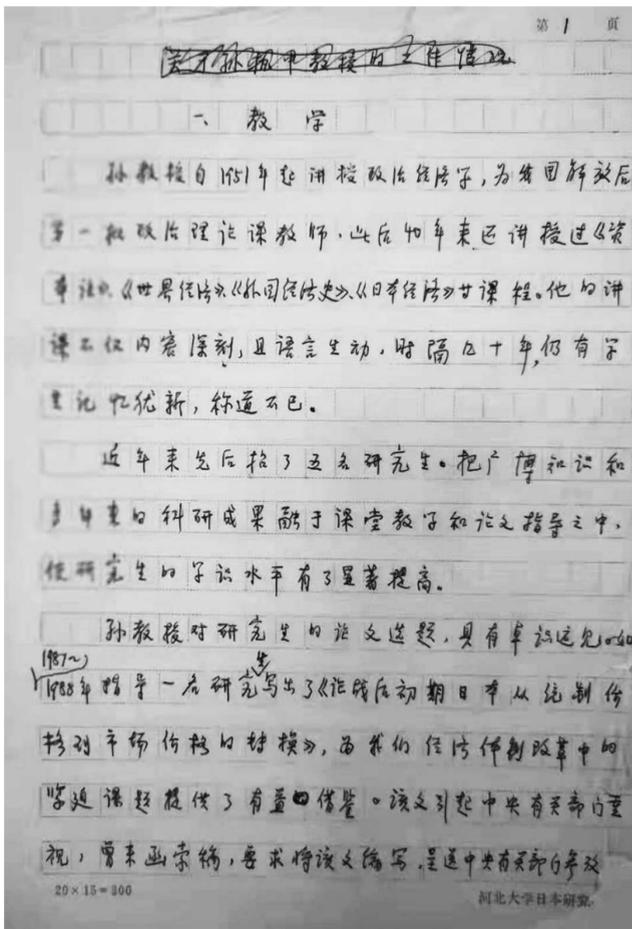
侯俊杰

2021年是父亲孙执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1979年前后父亲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的几篇文章，当我们看到父亲的文章是直接呈报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宣部等国家机关的相关负责人时，真的很震惊！

我们知道父亲为翻译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骄傲，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父亲的研究生侯琨然教授写下这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系列研究文章，回忆了父亲为我国制定翻两番的宏观经济计划提供了政策上的参考。

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孙华 孙青 孙园 孙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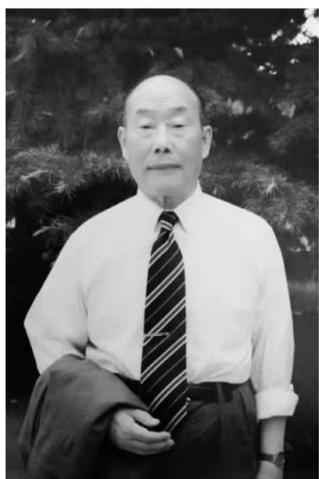
孙执中手稿

教育育人与科研咨政

孙执中先生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教育育人与科研咨政。他85岁时仍著书立说，尤其是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翻译与研究，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我国从1981年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十三大用国民生产总值取代工农业总产值），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956年，日本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同时也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内需不足、收入差距悬殊、地区间及企业间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为摆脱困境，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这是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性长期经济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实施效果看，“倍增计划”成就卓著。即：经过十年努力，超额完成了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统一，使日本成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前列。如国民经济增长率，原计划指标为7.2%，实际是10.9%，工矿业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为10.5%，实际是13.8%。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



孙执中

初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在编制长期发展计划，亟须学习外国经验，而国内之前没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计划方面的完整翻译资料。1979年春天，他在日本研究所资料室看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文原版书，敏锐地意识到该计划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参考价值，因为日本不仅与我们同为亚洲国家，而且起点也较低。战后日本的经

济奇迹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美好前景。但并不是大家都有共识。

据郭士信教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日语专业，1990年代曾任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回忆，当时她对翻译这本书心里有些忐忑：这样的书有谁会看呢？孙执中先生却很坚定：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他认为“倍增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其性质、目标以及政府的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倍增计划”中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创造能充分发挥民间企业活力的条件，具体作用有：充实社会资本；用教育训练等措施提高人的能力，振兴科学技术；充实社会保障与提高社会福利；引导民间产业。即政府不直接插手到民间企业内部，而是提供企业得以顺利开展活动的环境[参见（日）经济企划厅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孙执中、郭士信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5页]。

孙执中先生和郭士信教授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后由资料室的王艳平老师负责打字，王老师回忆说，当时为了加快速度，孙先生坐在她旁边，念一句，她打一句，有错及时纠正，连校对也一并完成；最后在清苑县装订成册，封面是黑底金字，一本杂志样式的硬皮书。

这本油印小册子，当即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同志的重视，

力主将“倍增计划”译文呈送中央书记处。据孙执中先生的手稿记述：“马洪同志向党推荐了此项成果，及时为国家制定20年翻两番的长远规划提供了参考资料”。孙执中先生在《日本经济研究工作的回顾——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日本经济》中描述，“当时马洪同志极关心这项工作的进程，看到译书后，即囑我们速呈送中央书记处和小平同志”（《日本问题研究2001年1期》）。1979年秋天，郭士信老师将9份油印本（书记处要7本）送到北京有关部门转交中央书记处。

同时，孙执中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胡企林副总编联系出版事宜，1980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第1次印刷了5400本。胡企林先生也是西南联大毕业，他亲力亲为，对译文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润色，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汪道涵同志看到此书，极为重视，1982年11月在上海市印刷四厂增印1.7万册，供上海市有关部门干部学习和参考。孙执中先生曾多次自豪地和我们后来的学生畅谈此事，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问细节。

深入的研究

翻译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孙执中先生又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79年11月22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研究报告》上发表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1980年1月28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编制方法和可供借鉴的主要经验》。1980年2月28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战后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1983年2月1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从日本“倍增”计划实现的条件看我国经济翻两番的途径》，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日本问题研究》等杂志。

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背景、性质和作用、重点解决的课题、实现条件、值得借鉴的主要经验等，他剖析了“倍增计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诱导”性质，指出日本政府利用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通过普及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和福利等政策，到1970年起超额完成了“倍增计划”。上述措施也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此外，孙执中先生还论证了我国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政策的可能性及其途径，重点分析了翻两番的资金条件、能源、技术和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孙执中先生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总是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信念，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断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六十余载教书育人鞠躬尽瘁，赤子情怀学术报国硕果丰硕。

（本文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

邮票上的中共一大

孙冰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纪8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邮票（1961年发行）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后转移至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继续召开。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烬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和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

1961年，中国邮政发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邮票，票面为中共一大会议。（作者单位为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



2001-11《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纪念邮票“邓恩铭”“何叔衡”“王烬美”，J123《董必武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蕃禺”铜鼎



1983年出土于象岗南越王墓，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中，1983年出土于象岗南越王墓、收藏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蕃禺”铜鼎，颇为引人注目。

此鼎通高21cm，腹径21.5cm。形态作盖器相合，圆底扁圆球形，盖上有钮。三足为较直的矮蹄足。设两长方形立耳。器素面无纹，器盖上刻

铭文“蕃禺，少内”4字；腹部外壁刻铭文“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9字，合计共有铭文13字。

“蕃”与“番”互通，秦军统一岭南后，设立了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以番禺为南海郡治，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这是广州建城的开始。

“少内”是秦代时设置的官职名，主要负责掌管财货，汉代沿用。

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聚焦最新发掘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 付裕）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边疆考古及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云”聚一堂，在两天会期内进行46场学术报告，研讨典型边疆考古遗址最新发掘研究成果和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表示，日新月异的考古成果缤纷不断、异彩纷呈，显示边疆考古在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他希望边疆考古人善用问题导向，不忘学科建设，在边疆考古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升华学科应用、方法与理论，夯实边疆考古越来越具有光明前景的根基。同时，也希望未来的边疆考古与内地考古更多交流、更多互动，共同促进、繁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同迈入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此外，由于中国边疆考古论坛



二道井子遗址高等级墓葬M138及出土彩绘陶

越来越成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希望能够将研究和发现予以系统记录，建议出版《中国边疆考古

论坛文集》。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表

示，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经历百年辉煌的庆典之年，100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学同样成果斐然。他认为，不仅要充分认识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继续推动边疆考古研究，同时，考古学者需要拓展国际视野，树立国际眼光，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入推动丝绸之路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此外，要加快推进边疆地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推出综合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整合全国各地以边疆考古为主的研究力量，推动边疆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和进步；同时，要充分发挥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在此次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会议当中，与会学者分别就2021年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收获、金上京皇城东门址考古发掘、东团山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盖州市青石岭山城2021年考古发掘、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发现与研究、喀什汗诺依遗址考古的初步认识、渤海贞孝公主墓研究、松嫩平原地区10-14世纪大型城址的分期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等相关边疆考古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